

“兰秀山之乱”与明代海禁

□石一民

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海禁始于明初

海禁,又称洋禁,是一种闭关锁国政策,禁止民间私自出洋贸易,严厉时甚至规定“尺板不得出海”;同时也限制外国商人前来中国通商。中国历史上曾有两个朝代大规模推行过海禁政策,一个是明朝,一个是清朝。

明政权建立初期,其实并未实行海禁和禁止民间商贸往来,而是沿袭元代的传统,积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,先是于吴元年(1367)在太仓黄渡设立市舶司,以浙

东按察使陈宁等为提举。洪武三年(1370)虽然关闭了太仓黄渡市舶司,但随后又在宁波、泉州和广州设立三市舶司,并规定“宁波通日本,泉州通琉球,广州通占城、暹罗、西洋诸国”(《明史》卷81《食货志五·市舶》)。

然而,上述这种开放局面并未能够维持多久。最迟在洪武四年(1371)十二月,朱元璋就一改之前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,颁布了海禁令,禁止居民任意出海

贸易。《明太祖实录》卷70载:“洪武四年(1371)十二月,诏吴王左相靖海侯吴祜,藉方国珍所部温、台、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充船户者,凡十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人,隶各卫为军,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。”这是最早明确记载明初海禁政策的史料。从“仍禁”的用词来看,显然在洪武四年十二月之前已有禁海令出台。

“兰秀山之乱”竟是导致明代海禁的重要因素

那么,朱元璋为何会放弃宋元以来的海洋开放政策,推行海禁政策?有学者认为,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的根本原因,是为了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,防止商品经济对封建农业经济形成冲击,最终危及封建统治。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出身赤贫农民的皇帝,朱元璋脑袋里装的是“鸡犬之声相闻,老死不相往来”的简朴农业社会理想。因此,在明朝政权逐渐巩固之后,朱元璋便放弃了海洋开放政策,转而走上了“重本抑末”“重农抑商”的道路。

其实,朱元璋实行海禁,更直接、更重要的原因,就是所谓的“海疆不靖”。这从上述洪武四年(1371)十二月的海禁令就可以看出来。当时对明王朝构成威胁的主要是东南沿海的两股势力,一是在元末战争中被朱元璋打败的张士诚、方国珍的残余势力,二是来自日本倭寇的侵扰。

元代末年,民不聊生,各地起兵反元,在江浙沿海起兵者为张士诚、方国珍等。张士诚在平江(今江苏苏州)称吴王,占据绍兴至徐州广大地区;方国珍占据台州、温州和庆元(今宁波)等地。到至正二十七年(1367),朱元璋已先后击败了张士诚、方国珍,控制了浙江全境。洪武元年(1368),朱元璋在南京称帝,正式建立了大明王朝。但浙江沿海并没有因此而安定,这一年就爆发了“兰秀山之乱”。

“兰秀山”是浙江舟山群岛中的两个岛屿兰山(今

大长涂岛)和秀山的合称,元末明初隶属昌国州。两岛居民向以“悍勇善斗击,习海事”出名。方国珍于至正十五年(1355)攻占昌国州后,便在兰山、秀山等岛聚集一批武装力量。方国珍被朱元璋打败后,在舟山群岛的方国珍残余势力并不支持新建立的明政权,因偶得方国珍的元朝“行枢密院印”,遂以此为号召,组织队伍起来反明,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兰秀山之乱”。

吴元年(1367)十二月,朱元璋命征南将军汤和、副将军吴祜等率水师自庆元由海道南下征讨陈友定。次年即洪武元年(1368)正月,明军攻破延平,俘虏陈友定,平定了福建全境。四月,明军水师班师北还,当他们驻扎昌国州时,竟遭到由兰秀山岛民组成的民兵的袭击,汤和手下的两指挥徐珍、张俊及部分官兵被打死,损失惨重。一带岛民为何会对明军水师发起袭击?原来,早在这年正月,兰秀山民兵就在叶希戴、王子贤、陈君祥的率领下攻打庆元府城,表明了其反对明政府的鲜明立场,结果兰秀山民兵被守卫庆元府城的明军打败。三月七日,兰秀山民兵的另一首领陈魁四领着船队在定海(今镇海)甬宝山港口等候,拦截明军。四月,正赶上汤和、吴祜水师船队班师回庆元,四月十八日两军在崎头洋交锋,于是发生了明军两指挥战死一幕。明军水师大失颜面,岂肯罢手,于是进入昌国州,全力围剿。兰秀山民兵溃败,退守夏山。五月,兰秀山民兵一部分余党又伺机攻入象山,失利后逃亡海

上。与此同时,陈君祥等一百余人逃往高丽,藏身全罗道古阜郡等地。陈君祥等人逃往高丽,这应与元末他们经常到高丽经商的经历有关。

洪武三年(1370),陈君祥等人的行踪被在高丽经商的庆元人鲍进保发现,鲍回国时,将陈君祥在高丽的消息报告给了明政府。六月二十四日,明朝中书省派百户丁志、孙昌甫等携咨文前往高丽,要求引渡陈君祥等人。高丽王迫于明朝的压力,下令将兰秀山“叛民”陈君祥兄弟及其余党一百多人移交明朝使臣。至此,兰秀山之乱彻底平定。

明军两指挥在“兰秀山之乱”中战死,令朱元璋非常震惊,大将汤和还因此没能封公爵。朱元璋意识到在浙江沿海的方国珍残余势力不容小觑,于是在洪武四年(1371)十二月,下令将方国珍旧部连同兰秀山船户共111730人由原来的民户改为军户,编入不同的卫所,从此将他们牢固控制起来。同时开始实行海禁政策,禁止浙江等地沿海民众出海,其目的正如朱元璋自己所说:“朕以海道可通外邦,故尝禁其往来”(《明太祖实录》卷70)。元末方国珍、张士诚割据江浙地区时,他们都与高丽聘使往还,建立了密切的政治、经济联系。仅据《李朝实录》一书记载,方国珍在1358~1365年间,就5次遣使高丽。朱元璋害怕方、张残余势力继续与高丽往来,为切断这种联系,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实行海禁。

明代海禁与东南沿海倭患

促使朱元璋实行海禁的另一个因素是倭寇问题。元末明初,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分裂的混乱时期,一些失意武士、无业游民和走私商人等,结伙为盗,不断到中国沿海进行抢劫,史称“倭寇”。与之相呼应,国内也出现了方、张残余势力和其他沿海反叛者与倭寇勾结犯边的危险迹象。据统计,洪武年间,倭寇骚扰中国沿海达44次之多,其中浙江被扰16次,为倭患最多地区。面对倭患,朱元璋起初试图通过外交努力而睦邻自固,但收效甚微。于是转而通过海禁政策来加强对沿海的控制。

朱元璋虽然在洪武四年(1371)颁布了海禁令,但是出海贸易已经成为沿海地区居民重要的经济来源,岂是一纸禁令就能完全禁绝的?于是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便一再颁布海禁令,层层加码。洪武七年(1374),撤销了明州、泉州、广州三处市舶司,全面禁止民间海外贸易。洪武十四年(1381)重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,洪武二十三年(1390)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;洪武二十七年(1394),禁民间用番香番货,企图从源头取缔出海贸易。洪武三十年(1397)申禁人民不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。同年,朱元璋将海禁令写入《大明律》中,主要内容有:(1)禁止沿海官民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及私自驾船出海通番;(2)禁止民间贩卖和夹带番货;(3)禁止私运违禁货物出海。自此海禁令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,成为明代的基

本国策。

与此同时,为了保证海禁能够得到切实的执行,朱元璋下令在沿海各地筑城,设立卫所,设置巡检司,逐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沿海防御体系,严密封锁了东部沿海地区漫长的海岸线。不仅如此,洪武二十年(1387),朱元璋听从左参议王锐的建议,颁行“迁海”令,在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等沿海地区,凡发现有海商活动的地方,一律墟地徙民,实行坚壁清野,彻底断绝海外与内地的联系。

明成祖朱棣即位后,仍然重申海禁,他虽然曾派遣郑和七次率领两万余人规模的船队,出访西洋地区的数十个国家,史称“郑和下西洋”,创造了中国海外交通史上的奇迹。但其主要目的是向海外炫耀大明帝国的声威,属于“形象工程”,而不是出于对外经济贸易的需要。宣德八年(1433)后,海禁政策时紧时松。正德五年(1510),明武宗推行“抽分”政策,准许对私人海商征税,海禁政策出现较大的松动,加之正德、嘉靖间,西方殖民者陆续东来,私人海外贸易得以发展兴盛起来。

到了嘉靖年间(1522~1566),面对东南沿海日趋盛行的私人海上贸易,明政府并没有因势利导,仍坚持海禁,导致东南沿海地区发生严重的倭患问题。事实上,明朝的海禁政策并不能阻遏浙江地区海外贸易日趋繁盛的势头,甚至出现了海禁越严厉执行,走私

贸易就越活跃的状况。正如明人徐光启所说:“官市不开,私市不止。”(《明经世文编》卷491《海防迂说》)嘉靖年间,日本、葡萄牙等国的商人,纷纷来到位于今舟山市境内的双屿港,与内地商人交通接济,双屿港由此成为当时东南沿海最大、最有名的海上走私贸易港口。虽然双屿港最终被明军摧毁,但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海上私人贸易的兴盛,与明政府的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形成激烈的冲突,最终引发“嘉靖倭患”,使东南沿海地区陷入一场延续数十年的空前浩劫之中。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,明朝中期以后所谓的“倭寇”,其实大多数是中国人,他们由于海禁不能从事正常的海外贸易,转而进行海上走私。闽浙地区土地少,又多贫瘠,沿海百姓无法依靠农业生存,于是铤而走险,沦为海盗。做海盗不是目的,生计成问题才作乱。

到了嘉靖后期,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海禁是造成倭患的根本原因,因此随着倭寇问题的缓解,社会各阶层要求开禁的呼声越来越高,迫使明政府接受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,于隆庆元年(1567)对海禁政策作出局部调整,允许民间商人由福建漳州月港出海,准贩东、西二洋,史称“隆庆开海”,但仍不准往日本贸易。然而,这仅仅是一时权宜之计,海禁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没有被废除,一直延续到明朝末期,并被清朝所沿袭。

明代海禁带来的消极影响深远而沉重

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,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时中国周边环境的相对安定,但从长远来看,更多的是消极作用。它逆历史潮流而行,遏制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,使宋元以来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局面遭到空前的重创。海禁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更是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。实行海禁的明朝正处于14~17世纪,其时世界正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。随着西方航海家的“地理大发现”,世界市场

逐渐形成,西方大踏步地跨入近代社会。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,中国却关闭了自己的国门。

海禁将中国同世界人为隔绝开来,阻碍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,固化了统治者坐井观天、夜郎自大、故步自封的观念,葬送了宋元时期创造的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遇。海禁导致中国海洋观的倒退和中国航海业的衰落,把辽阔的海洋拱手让给了西方,最终让西方的军舰横行于中国沿海。美

国历史学家博克塞(1886~1976)曾对当时世界的海权形势评价说:“要感谢中国皇帝孤立的海禁政策所造成的刻意缺席,使得葡萄牙人能在毫无东方海权的抗衡下,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印度洋上的主宰者。”

明代海禁,让曾经的海洋大国就此自废武功,从海洋退缩,变得日益封闭和保守。其带来的消极影响深远而沉重,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。